

钱穆宾四先生研究概述¹⁾

钱 婉 约

一，生平著述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一代儒宗。

早年就读于清末常州府中学、南京钟英中学，因武昌起义而辍学。遂在无锡乡间多所小学校教书十年，1922年起先后在厦门集美中学、无锡省立第三师范、苏州中学等校任教。这期间，自学苦读，精研学问，出版基础性国学著作《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

1930年，因同乡顾颉刚推荐，《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刊出，被学界推重，转至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自此开始大学教学研究生涯。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无锡江南大学等校任教。这期间，连续出版一系列对于经学、子学的研究著作，如《王守仁》《墨子》《周公》（译自林泰辅著作）《惠施公孙龙子》，以及对于老庄生平著述的系列考辨。诸子考辨远自1923年开始着手，十多年后汇集成体大思精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1935年出版，一时轰动学界，备受推崇。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期间，先后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首度以一人之力，开设“中国通史”课程。相继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文化与教育》《政学私言》《中国文化史导论》等重要著作，其中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部定大学用书”，被誉为“激励民族感情”，“书生报国”的典范（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而此书史实之简要明当，史论之一家独

步，也使它超越教科书而成了“中国史学之经典”。（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

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艰难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其间，多次应邀到台湾各地、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马来亚大学等处讲学访问。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196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在新亚书院的16年，学术思想渐臻圆熟，出版有《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记地名考》《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著作，在港台和海外传播甚广，影响颇大。

1967年起定居台北，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论”等课程。课余一意著述，出版《朱子新学案》五大册，堪为朱熹研究划时代著作；结集出版上古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历代思想史论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大册，另有《古史地理论丛》一册，演讲录《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则是为新亚书院“钱宾四学术讲座”首讲之记录稿。《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记录作者一生教学、著述、交游、颠沛之经历，也是八十年来中国社会学校教育、学术演进的一个缩影。晚年有《晚学盲言》《新亚遗箴》等随笔演讲集出版。

1990年8月辞世，1992年归葬故乡太湖之滨。身后著作，由遗孀钱胡美琦女士与部分钱穆晚年弟子共同组成“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为《钱宾四先生全集》甲（学术思想）乙（历史学）丙（文化人生及杂著）三编，凡五十六种五十四册，约一千七百万字，1998年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经钱穆著作版权继承者授权，中国大陆九州出版社以台湾联经版为底本，2011年出版《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及各种单行本。在大陆，另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不少钱穆先生单行本，版权由台湾三民书店授予，用的底本则是钱穆身前交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是未经版权继承人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订正过的旧本。另外，近年来，以“钱穆讲授 叶龙记录整理”署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中

国通史》，是叶龙个人整理当年听课笔记之成果，非钱穆本人或家属授权。这些讲稿与讲演内容，作者身前已取精删芜，写成论稿或著作出版过，后收入全集。还盼读者幸加辨析。

以下，就个人并不完全的掌握和粗浅的阅读认知，向关注钱穆著作与研究的日本中国学界同仁，介绍大陆、港台关于钱穆研究的概况。

二，身前的学术影响与评论

对于钱穆学术的评论与研究，从他进入燕京大学的1930年就已经开始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诸子考辨以及《国史大纲》展开了学术评论与争论。一方面是钱穆用时代性的新考据方法，使相关研究有突破性的推进。如用年谱排比史事的形式，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持论有“不可通者二十八端”，对晚清以来今文经学昌盛起到反拨作用，在得到一片赞誉的同时，也受到质疑（如《古史辨》第5册青松《评〈评刘向歆父子年谱〉》）。又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用“《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又把诸子放在二百年的联系比对中做整体的研究，“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提出了对于诸子的系统性新结论。特别是钱穆关于庄先老后的论断，引起学界持续性论争，一时形成老子考辨之热，而作者持论不变（胡适《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清华周刊》1932年9-10期等）。另一方面，围绕《国史大纲》的评论，主要是在思想义理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国统区以激励民心为中心给予肯定性赞誉，革命区对于书中“复古”、“反民主”的倾向发出批评的声音。

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新华社评论《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点名“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影响甚大。在接下来的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钱穆的著作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其评论研究也几乎停歇，只是零星的延续革命时代对于《国史大纲》等的进一步批判。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文化学术渐

渐复苏，对于“五四”以来一味反传统的“革命思潮”出现反思。同时，要正确地认识传统、继承传统，民国时代的思想学术成果，就成为“温故知新”的必经之路和出发点。在此契机下，正面肯定钱穆学术，介绍他的某一本著作或评析他某一方面的学术成果，逐渐在当时经典性的文史杂志和先锋性的期刊上刊出。最早的书评和论文，主要涉及到《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以及《中国文学讲演集》五种书。罗义俊以其《钱宾四先生学术著述编年》（《文教资料》1986年3期）《钱穆先生传略》（《晋阳学刊》1986年4期），以及对于钱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成果，成为大陆钱穆研究起步时期的一个代表性学者。当时，对于钱穆的研究，集中在他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文化观”等三个方面。叶秀山《中西文化之“会通和合”——读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随感》文（《读书》杂志1988年第4期），钱婉约《钱穆及其文化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是那个时期较早的对于钱穆学术思想与文化学的研究成果。

1974年、1984年，是钱穆先生八十、九十岁诞辰纪念之年，港台在1950年代以来研读钱穆著作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纪念性学术文集。如《钱穆先生八十纪念论文集》（新亚研究所，1974年）《庆祝钱穆先生八十岁专号》（新亚图书馆，1985年）《钱穆传记资料》（一、二、三）（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1981、1985年）《钱穆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新亚研究所，1986年）等。

三，身后的纪念性论集及传记著作

1990年8月，钱穆在台北与世长辞，《人民日报》连发《钱伟长电祭叔父钱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电唁钱穆先生家属》二则新闻，表示了大陆官媒对待一位曾经被批判的学者的新的动向。港台学界及各相关杂志，则发表了一系列的悼念文集、生平略历及著书目录等。《法言》10月号刊出《钱穆悼念专辑》（霍韬晦主编，1990年）、《民间史学》有《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另外，台湾《联合报》、《新亚生活》月刊、《鹅湖》杂志等，也纷纷刊登严耕望、金耀基、许倬云、杨祖汉、戴景贤等人的悼念文章和钱穆生平

介绍。

纪念性学术论著尤以钱先生二位高足弟子的著作为代表：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笔耕史治史五书之三》（1992年），其中“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在叙述钱穆生平的同时，准确揭示和高度评价了钱穆的治学意趣和人生境界。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1991年），用“一生为故国招魂”概括钱穆毕生学术的归旨，并通过“钱穆与新儒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等专题性研究，分析了钱穆与五四主流派胡适、与马克思主义派郭沫若、以及与新儒家学派代表熊十力等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侧面。此二书在港台出版之后，大陆也相继出版。

在钱穆诞辰与逝世的纪念年份，港台大陆分别有纪念性学术研讨会及论集出版。**逝世十周年**有《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编，2001年），《钱宾四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专刊》（钱穆先生纪念馆编，馆刊第八期，马英九题签）两种。**诞辰100周年之际**，有《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03年）《钱穆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吴大学钱穆故居管理处编印，2005年）；**逝世二十周年**有《钱穆研究暨当代人文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吴大学钱穆故居管理处编2010年），《纪念钱穆仙逝二十周年专辑》（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2010年）。**诞辰120周年**，2015年7月，有“承继文化衣钵，心系历史生命：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在江苏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举行。2018年11月，弘道书院与孔子研究院在常州继续联合举办了“钱穆先生与中国文明的现代成熟”学术研讨会²⁾。**逝世三十周年**，在疫情席卷全球的不利形势下，仍然有北京和台湾举办专场学术研讨会，其特点是突出专题性研究主题，北京的侧重在政治学视野下探讨钱穆学术的现实政治意义及未来展望，有《文明竞合与秩序重整：钱穆逝世三十年后的新世界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10月），台北的则从史地研究出发，兼及钱穆学术思想之其他领域，有《史地学术暨钱穆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台

北市立大学历史与地理学系 2020 年 11 月)。这些会议与论文集,相隔五年、十年,汇集了两岸三地有关钱穆学术领域的重要学者,济济一堂,研讨钱穆在传统史学、经学理学、文化学、政治学、历史地理学、近代学术等诸多领域的突出成就及其当代意义。一个现象是:1990 年之后的三十年来,随着大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步伐,钱穆研究成果由港台早于和多于大陆,而迅速翻转到大陆远远多于港台的倾向。

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按时代顺序,回忆记述了他八十年学术人生中的重要师友及教学著述活动,为后人进行他的传记类研究与撰写,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关于钱穆生平传记及学术评传类著作,按时间顺序列表如下: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新亚生活》月刊 1990 年 10 月、11 月两期。

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传略》(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5 年)等二种

陈启云《钱穆师与“思想文化史学”》(台北:市立图书馆 1995 年)

郭齐勇、汪学群合著《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李振声《钱穆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7 年)

汪学群《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等三种。

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等二种

印永清《钱穆:百年来中国史学界第一人》(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 2002 年)等三种。

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六册,(台北:国立编译馆 2005 年。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

徐国利《一代儒宗钱穆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陆玉芹《未学斋中香不散:钱穆和他的弟子》(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周育华《君子儒钱穆评传》(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1 年)

钱胡美琦著，秦照芬编，《宾四先生与素书楼》（台北：台北市立大学·钱穆故居2015年。钱夫人遵钱穆遗愿，就他们夫妇晚年搬出素书楼前后的事件缘由，对世人的一个澄清与交代。）

四，近三十年分类概述

（一）成果数量剧增与民间自发研读

近30年来，大陆阅读钱穆著作、研究钱穆学术的状况，可以说经历了从沉寂，到复苏，到研究成果井喷式增长的状态。2020年，徐国利教授出版《钱穆学术思想学术研究论集》一书，附录有“钱穆研究基本文献汇编”³⁾，收录了从1930年至2019年间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84部，以及在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及随笔杂文818篇，据编者称，这是从近2000多篇检索结果中删重择要筛选出来的。以徐教授此“文献汇编”为基础，笔者增补2020年至今一年半的资料，做一个粗略的数据分析。从论文数量上看，1930年代至1989年，一共74篇，约每年15篇；1990年代至2019年，一共743篇，约每年37篇；2020年以来一年半之间，竟有68篇之多，可见研究升温之快，成果之多。

学术界研究成果频出以外，士农工商等非专业人士的业余研读活动也呈活跃态势，对于这方面的情况，特介绍两个持续有年、具有代表性的活动。

“钱穆与中国文化”微信公号：由读者个人先于2012年12月设立同名“新浪微博”，2014年3月改为“微信公众号”，编者利用业余时间，逐日或隔三五日，编辑发布“钱穆论著”的专题性文摘，八、九年来持续不间断。编者自述：

“作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和爱好者，在研读了钱穆先生的系列著作后，深深地被文字中透出的‘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所感动。在‘杨柳千条尽向西’的西化风潮中，钱先生等少数前贤保持着惊人的清醒和洞察，忧心忡忡，苦苦支撑，不惜眉毛拖地为后辈抉发和传授文

化精义，每每想来，不禁动容落泪。同时，钱穆先生书中的观点和论述，对于我们学习本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传承道统文脉、士人精神等各方面，都给予了诸多指导和引领，犹如海中明灯、天上北辰。……我们没有功利目的，若能在传承中国文化的大事业中尽些绵薄之力，固所愿也⁴⁾。”

钱穆先生共读会：是一个专注钱穆先生著述共读的民间读书组织，由出版《钱穆先生全集》的九州出版社有识人士发起，成立于2015年8月，同名微信公众号“读钱穆”（readqm）同时上线。读书会的成员为志愿认真研读钱穆著作之人，无长少区别与专业门槛，并邀请高校及社会学者做学术顾问及导读教师。读书会自称：

“我们致力于对钱穆先生为人与为学的研习和传承，在温情与敬意中追随钱穆先生。并以期通过组织书友共读的方式，为普及传统文化和惠及国人尽一份微薄之力。至今已经共读过的先生著作有：《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学龠》《阳明学述要》《宋明理学概述》《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政学私言》《八十忆双亲》《四书释义》《中国历史研究法》《国史大纲》《论语新解》《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现代学术论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十七部著作。”⁵⁾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大陆高校以钱穆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博士论文9篇，硕士论文74篇之多，分属于历史学、哲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

以下分类介绍近30年的钱穆研究成果概要。

（二）史学研究

史学方面，围绕钱穆先生代表作《国史大纲》以及他是否是新儒家的研

究，令人瞩目。此外，关于钱穆史学思想、史学观念以及史学理论、治史方法等方面的探索，也多有展开及深入。

罗义俊较早发声，1992年《史林》第4期发表《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略及钱宾四先生史学的特性与意义》，认为“《国史大纲》不仅是奠定钱先生史学地位的主要基石，而且由此史学代表作已展现了他的基本的新儒家思想，故而亦是钱先生作为当代新儒家的标识与定位著作。”随后又有《经济世 培养史心——钱宾四先生新儒学史学观论略》（《史林》，1995年第4期），提出钱先生的史学包含三层意义：一般学科分类下的历史学意义、历史哲学的意义与儒学的意义，认为钱穆既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史家，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儒家。与此同时，余英时先生作《钱穆与新儒家》长文（1992年7月），对于钱穆新儒家的问题予以历史的与理论的澄清，指出：“钱穆先生逝世以后，报章上的纪念文字颇有人把他划入‘新儒家’的旗帜之下，但钱先生生前雅不愿接受此荣衔。这不仅因为他极力要避免建立任何‘门户’，而且更因为‘新儒家’的概念有特殊涵义。……”指出将钱先生称为新儒家，其史学思想归为新儒学，是极不合适的。关于钱穆是否新儒家的问题，也一时成为讨论热点。及至2020年，还有秦际明《20世纪理解儒家政治的两种进路——再论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福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的论文。

历史观方面，上引徐国利教授著作中第二编“钱穆的历史文化观”一组论文，从民族文化生命、历史本体心性论、中西文化比较、圣贤观等多个角度，分析了钱穆的历史观是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其历史观的核心在于仁的“心性论”本体，指出钱穆的中国历史观具有道德文化决定论和儒家道德文化至善论的倾向。

此外，蒋义武《钱宾四先生之历史思想》，黄俊杰《钱宾四史学中的“国史”观：内涵、方法与意义》，徐国利《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等文章则在历史观之新，史

学思维之创见，史学理论方法之特色等方面，有所创获。

关于上古史研究、清代学术研究等方面，有罗义俊《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廖名春《钱穆与疑古学派关系述评》，陈祖武《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李桂花《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与现代疑古运动》等文，主要从钱穆与古史辨派、《刘向歆父子年谱》所涉及的今古文之争以及“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成就等方面展开研究论述。

（三）思想史研究

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钱穆的先秦诸子学、汉唐经学及朱王学的研究展开。相对来说，对于诸子学及经学的研究较少，朱王学则内容较多，这固然与钱穆本人的研究重点和成果的多寡有关，也反应了当代学术界对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关注的热度升温。

诸子学研究，较早者有张涅的《钱穆的公孙龙子研究》，肯定了钱穆对《公孙龙子》一书新的系统的解读，在名学研究史上不可忽略，在当代依然有哲学认识上的意义。胡辉《钱穆〈老子〉研究述略》，认为钱穆研究老子能够“出入各家，深刻洞察先秦学术思想，把握其演进轨迹，在这个基础上，运用‘思想线索’论证法，得出《老子》一书晚出的结论，成一家之言。”肯定钱穆《老子》研究“注意和同是道家的庄子、儒家的孔孟以及后来的《易》、《庸》进行比较，气魄之大，学力之深，令人叹服”，同样立意的，有台湾《鹅湖》杂志之贾忠婷《钱穆“老出庄后”主张之理论的考察》一文。王晓黎《“君子不器”：钱穆“士”思想研究》，提出钱穆是在道统、政统与学统三者的关系上，探讨如何实现“君子不器”之人生大道，是对先秦诸子文化中士文化的新阐述。

经学方面，有许刚的《平议今文古文与总结许学郑学：钱穆与张舜徽两汉经学研究之比较》，认为钱穆、张舜徽先生两家关于汉代经学研究的内容各异，方法亦不同，钱氏以史治经，于史学的立场而为经学揭示真精神；张氏则由小学入经学，表现出“考镜源流，厘析篇帙”的文献学特色。但是，

两个人有一个根本的共同之处，即“会通”的精神与方法，堪为后世之学术典范。

关于朱王学研究，可以分为理学观的探讨与朱子学探析。理学观方面主要有吴展良：《学问之入与出：钱宾四先生与理学》，汪学群《钱穆的理学观》，姜虹《钱穆清代理学观述论》等，在分析钱穆理学观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清代学术思想与宋明学术的渊源关系。朱子学方面，在八十年代杜维明《儒学传统的改建——钱穆〈朱子新学案〉评介》文基础上，陈代湘有《论钱穆与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研究》、《牟宗三与钱穆朱子学研究主要差异述评》、《钱穆的朱子心学论评析》三篇文章，对钱、牟二先生关于朱子学研究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论，并对钱穆在心学研究中重朱子而轻陆王的特点提出思辨性质疑。赖功欧《论钱穆的朱子学》，乐爱国《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石力波《钱穆的朱子学研究》等文章，则认为：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是对于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同时强调“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开拓了朱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文化学研究

关于钱穆文化学领域的研究，从整体的文化观、文化学理论，到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均有研究。一方面是对钱穆文化学研究的宏观介绍和定性评价，另一方面是就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阶段或具体问题的研究论说。比如关于钱穆文化学理论的不同方面，如“人文演进说”、“文化类型说”、“文化救国论”、“文化自由主义”、“中西文化观”等，均有专门的论文进行分析评说，体现出学界在新时期钱穆研究升温的同时，对于文化学研究、对于民族文化自信心、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等问题的关注升温。

这方面，有梁淑芳《钱穆文化学研究》2008年，《钱穆〈论语新解〉研

究：以比较为主要进路的考察》2013年，两部著作均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

钱穆去世前，经夫人笔录整理的最后一篇文章《天人合一观——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开头说：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于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

这篇钱穆最后的遗稿，全文虽然仅有2000多字，却被研究者称为他留给世人的著名的“钱穆之问”。这篇文章随后被镌刻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面向吐露港山坡上的一处花岗岩墙体上，并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修建了“合一亭”。站在“合一亭”一眼望去，亭边池水与吐露港海水远近合为一体，海天上下也合为一体，这里是新亚标志性景点，也成为香港新的著名景观。关于“天人合一”观，钱穆的遗篇论断明确而不及详论深研，引起哲学界、思想界包括重要学者在内的很多人的回应性论述。如蔡尚思1993年《天人合一论即各家的托天立论——读钱穆先生最后一篇文章有感》，汤一介1995年《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季羨林1996年《钱穆的“天人合一”观——中国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以及梁淑芳2004年《钱穆先生论天人合一观初探——以〈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为中心的考察》，朱寰2004年《钱穆天人观的转变》，直到2019年还有杨泽波《回应“钱穆之问”——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天人合一问题的再思考》等文章，借着“钱穆之问”分析介绍了儒道两家“天人观”的价值意义区别，以及对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启示。2014年，钱穆弟子余英时出版了《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重点阐述了巫文化如何变化为先秦诸子各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与“治气养心”、“修德”“求道”的深层关系。应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研究，并未结束。

（五）文学、教育学、政治学研究及其他

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钱穆的“文学观”与“诗学理论”方面。文学观方面，郭士礼《钱穆的文学史料观及其史学实践》指出，钱穆是从“道”“艺”关系这样传统的命题出发，把中国传统文化之“道”贯穿于文学、史学、哲学等诸“艺”之中来看待和言说的，说明钱穆文学观与其历史观、文化观是不可分割的。在诗学方面的研究，有侯敏《钱穆文化诗学探论》，刘梦芙《钱穆先生诗学综论》，前者从文学之根、和合之美、人生诗化等方面展开论述，认为钱穆先生汲取古代文化的母乳，在此基础上丰富现代文论言说的底蕴，使学术目标变得具有理性的可感性和可握性，其充满历史意识与诗心情趣的文学观念，彰显了一种有根的中国诗学。后者则提出儒家的道德伦理和政治观念是钱先生诗论的思想核心。

钱穆的一生是做教师的一生，自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其中艰难创办新亚书院，辛劳执掌大学之政十有六年，留下《文化与教育》《新亚遗铎》等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思想文献。因此，围绕钱穆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理念的研究也不少。如魏兆锋连续三本书2016年《执两用中：钱穆教育思想研究》、2018年《钱穆教育生涯的历史考察》、2019年《新亚书院研究（1949-1965）》，均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论文方面，对于钱穆新亚书院时期的办学经历与教育思想，对于钱穆注重“中国人”观念的人文教育，还有钱穆注重“德性教育”、“通识教育”、“人生践行”等方面的教育思想，也都有专门涉及。随便提及，钱穆当年只身离开大陆辗转港台，长期与家人儿女别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重新相聚。其次子钱行，参与整理父亲全集的部分工作，读父亲书，学习体悟父亲的教诲，才得以增进对父亲的认识，一篇篇读书随笔集成《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一书，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多年后，增订本改名《温情与敬意——走近父亲钱穆》，仍由九州出版社2020年出版）。

近十年来，政治学研究者着力挖掘钱穆学术中的经世情怀和政治理论意义。姚中秋的《秩序底定与史学再造——围绕钱穆的讨论》、《钱穆政治学初

探》两篇文章，从经世之学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讨论钱穆思想的政治学价值。又有《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辨》通过讨论张君劢和钱穆的思想分歧，揭示钱穆经史之学背后对于现实政教秩序建构的经世理想与制度探索。任锋近年来致力于对钱穆经世理想、政治理论的系统性探究，他的《立国之道的新和旧：钱穆与中国政治学的自觉》一文，运用他“立国思维”的理论框架审视钱穆政治思考的方法与思想根基，将钱穆视为探索中国政治学的先驱。在此后的《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中，将钱穆的中国政治学范式表述为“历史政治学”。这方面的新研究还有：任锋《待解放的先知与被重构的传统》（《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春之卷），任锋《“会通为体，分别为用”——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大义家言》（《开放时代》2021年第2期），田飞龙《〈政学私言〉中的钱穆法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中国政治学》2021年第1期）、任锋、马猛猛《“建国于大地之上”：钱穆的首都论、立国形态观与文化地理学》（《思想战线》2021年第2期），苏鹏辉《由此及彼：钱穆的立国论与宋学观》（《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4期）等，这些论文体现了在钱穆研究的学术园地中，一个新视角新领域的蓬勃发展。

钱穆并没有关于美学的专门著述，但对于中国传统美意识的言说渗透在他的很多论述中。这方面研究有宋薇《汉字的艺术——钱穆论中国文字的美学意义》《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钱穆生生之乐见解的美学阐释》《钱穆“道”论及其美学阐释》等四篇文章，分别从文字学、文学、儒学等方面展开论述，分析钱穆的美学思想。另有赵建军《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出发，认为钱穆学术史观以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有关钱穆与同时期学人交往与学术关联的研究，也是饶有兴趣的课题，已有研究涉及到钱穆与顾颉刚、汤用彤、陈寅恪、张荫麟、杨联陞等人的交往与学术切磋，也有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交往与观点方法的分歧冲突等。这些文章对于在比较中凸显钱穆学术的思想

性格与方法特征，对于了解现代学人交往、学术史甚至学坛趣事逸闻等，也不无裨益。其中陈启云《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朱学勤《我时常想起鲁迅、胡适与钱穆》，周质平《“打鬼”与“招魂”：胡适钱穆的共识与分歧》，钱行《评鲁迅和白话文》等文，尤值得品读，启迪思考。又，学人关系方面，全集最后一册《素书楼余渚》收有钱穆致杨联陞、徐复观、严耕望、余英时等人书信；全集之外，近年又有陆国灿、黄浩潮编《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婉约整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1948-1957）》（2020年，中华书局出版），以及蒋力著《杨联陞别传》（2018年，商务印书馆）中所提及杨联陞致钱穆书信等资料陆续面世，或可作为今后钱穆研究的又一个新空间。

另外，对于钱穆著作中事实失误之处的商榷与补正有：宋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榷四则》，薛巧英《钱穆〈师友杂忆〉订误补正》等。

以上概述性介绍，希望纵向呈现大陆、港台关于钱穆研究的历时性变迁，同时，在钱穆学术所涉及到的不同学科领域中，尽量展示专家学者、青年学人共同开拓与耕耘的研究成果，包括民间研读之一斑。或不免遗珠，敬请钱穆研究学者与读者见谅。

註釋

- 1) 本文因陶德民教授相邀而作，出于论文的一般性规范，文中略去对先祖父钱穆宾四先生大人的敬语称谓。
- 2)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马猛猛、沈蜜博士同学提供两次常州会议的具体信息及政治学研究方面的专业介绍。
- 3) 徐国利著《钱穆学术思想研究论集》，附录三“钱穆研究基本文献汇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年。本文以下介绍到的论著，凡只列作者篇名，省略出版和期刊信息的，见此汇编。在此向徐国利教授致谢，读者可索引参见之。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对“汇编”也有补充和续编。
- 4) 感谢公号编者方放、刘影夫妇提供公众号相关编辑信息。
- 5) 感谢九州出版社古秋建先生提供读书会相关信息。

